

‘China and the West’ 中国与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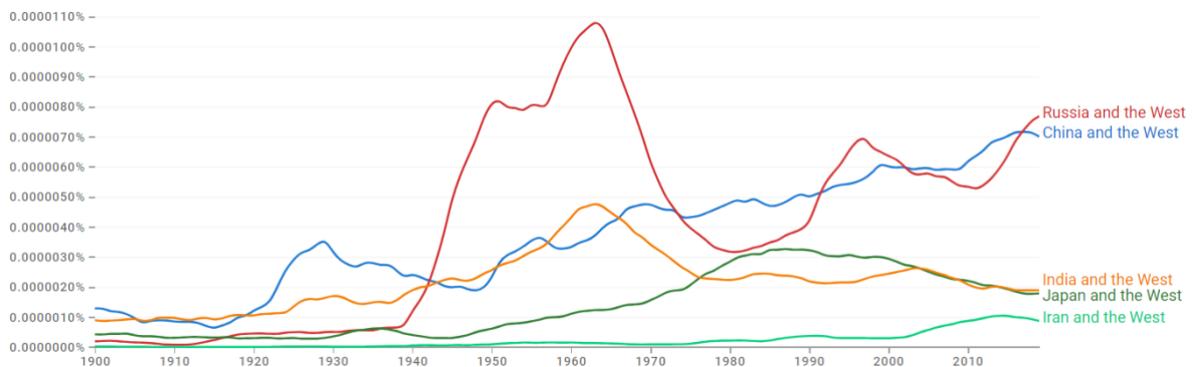
Suman Gupta

过去的十来年，犹如雷声滚滚，英文媒体愈演愈烈地播送着对“China and the West”（中国与西方）这个主题的焦虑思省。对“China and the West”这个短语的联想，似乎遍及方方面面，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军事以及其它领域；看来，这个短语已成为众多直接或间接的关于中国的述评的支点。

下面，让我以反思的方式，先从其本身（特别是在英文中）所示的因果开始，再逐步转向其使用语境，对这个短语进行探讨。

使用情况

从图 1 来看，一百多年来，“China and the West”一词的使用频率相当高，而且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与其他类似短语相比，只有“Russia and the West”（俄国与西方）在 1939-1980 年的长期使用率明显更高，然后在整个 1990 年代再现高频，其他时期则波动很大。在 1943-1950 年和 1957-1965 年两个短暂时期内，“India and the West”（印度与西方）的使用频率超过了“China and the West”。



Graph 1: Google N-gram for ‘China and the West’（中国与西方），‘Russia and the West’（俄国与西方），‘India and the West’（印度与西方），‘Japan and the West’（日本与西方），‘Iran and the West’（伊朗与西方），1900-2019。

语料库：英语（2019 年），平滑度：3。英语语料库的英式和美式部分总共约有 1900 亿个单词，这些单词来自 Google 图书语料库中数字化的印刷文本。Y 轴上的频率测量值是整个语料库中单词/短语出现的百分比；X 轴显示语料库中作品的出版年份。

这些比较性转变似乎与全球关注的政治时刻相吻合：1939-1980 年恰好涵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高峰期；1943-1950 年是印度独立的前期；1949-1957 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政府的

建立和巩固；1957-1965 年是中苏分裂和中印战争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见证了前苏联及其势力范围的解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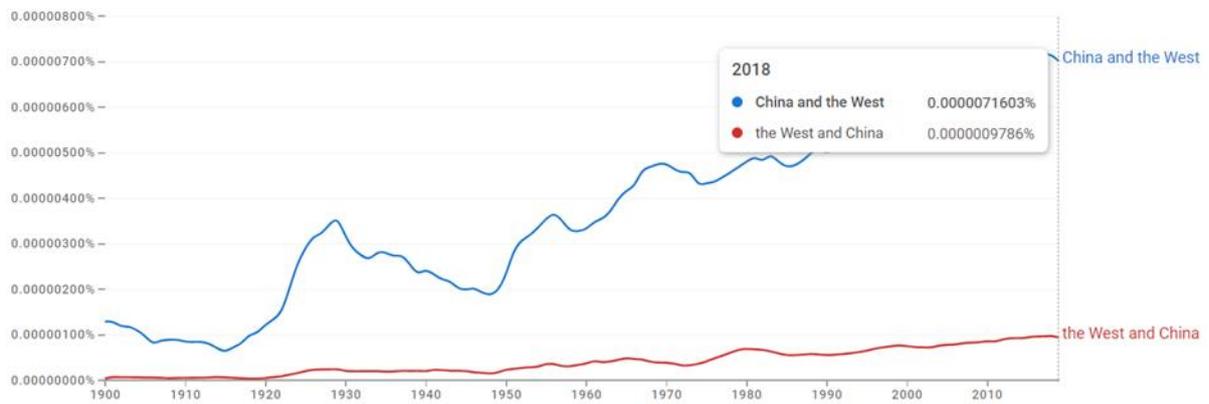
就我们关注的“China and the West”这一短语而言，它首次在 1915-1929 年间流行起来是颇有意思的。我将在下文中回顾这一点。与“China and the West”相比，“Russia and the West”的漫长发展轨迹值得深思，值得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

显然，“China and the West”这一短语构建了一种二元视角，仿佛双方是由于差异或对立而相互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该短语似乎将双方放在了同等的地位。因此，它似乎类似于“East and West”（东方与西方）、“Orient and Occident”（东土与西土），或者最近的“Global North and Global South”（北球与南球）。这类短语是备受讨论的空间或方向性二元，是通过定居和战争、殖民主义、以及冷战的历史形成的（例如，[Blair 2000](#)、[Brennan 2001](#)、[Hoerning 2023](#)）。

但“China and the West”与这类短语并不相符。这些二元术语有意义地并列了两个相互定义的方面；而“China and the West”显然不是这样。一方面是单一构成的名称，“China（中国）”（无论如何构想，以族群民人的角度还是以政体领土的角度）；另一方面是“the West（西方）”（通常突出北美和西欧国家）下的构成集合。更准确地说，“China”这个短语似乎代表着比其自身更大的东西。它似乎被用作一种提喻：也许是“the East（东方）”的结晶，或者是代表“the East”的特殊他者。事实上，这个短语已经暗示“中国”是东方西方差异的顶峰。中国是“东方不同”一种规范，是衡量其它较小的“东方不同”的尺度。

许多文献提出了中国是中西“本质差异”的典范这一论点，其中一些我将在后面提到。为了立即展示这个论点是如何几乎自动发挥作用的，约翰·布莱尔的一篇有趣论文《通过二元词组思维》值得查看（John Blair, [Thinking through Binaries](#), 2000 年）。文章的前部阐述地图学为何以“族群中心视野”为中心；後部讨论了东方/西方二元，以中文概念“**变化**”为例，高调展示二元结构的运作。布莱尔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中文的概念会强化他的论点，事实上倒也似乎如此。

现在来谈这个短语的另一个方面：其语序是大家都习以为常的“China and the West”（中国与西方），而不是“the West and China”（西方与中国）。虽然后者的使用已经悄然兴起，但听起来总有点不对头。图 2 对两者进行了比较。



Graph 2: Google N-gram of ‘China and the West’ and ‘the West and China’ , 1900-2019. In 2019, the former was used more than 7 times more frequently than the latter.

短语中的这种词序与其隐含的主语视角的有关。英语和中文的词序侧重点略有不同。在英文语句中，“China and the West”自然倾向于立足与“西方”（the West）的视角。这与将主语位置放在后面的惯例一致，比如“you and I” / “them and us”强调的是“我”和“我们”。然而，中文的对应词“中国与西方”的词序虽然相同，其自然侧重点却在主语“中国”上，并从那里延伸视角。这是因为“中国”的本义是“居中的区域”，它代表了一个中心位置，从这个中心位置可以看到和衡量不同方向的其他位置。短语“中国与西方”和“China and the West”的视角差别有可能指向概念形成与应用的不同传统。

比较英文文本中围绕短语“China and the West”发展起来的传统与中文文本中围绕短语“中国和西方”发展起来的传统将会很有趣。二者之间的重合、重叠、与独特程度可以解释很多地缘政治和文化关系。不过，在这里我只限于讨论英文短语。

1920 年代背景

我想指出的是，20 世纪 20 年代，“China and the West”一词的使用率突然上升（见图 1）引入了一些特定的联想，尽管此后这个短语不断适应着波澜壮阔的时代变化，这些最初联想依然存在。

19 世纪末，“Yellow Peril”（黄祸）一词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白人”和华人之间竖起了一道绝对种族主义的隔阂，集中体现了当时背景下日益增长的反华人移民偏见，并助长了殖民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掠夺。在整个 20 世纪，“Yellow Peril”种族主义一直此消彼长。

[Madeline Y. Hsu \(2015\)](#) 发现，在美国，“Yellow Peril”种族主义在二战后逐渐逆转，中国移民开始被视为“好人”。然而，[Christopher Frayling \(2014\)](#) 在 1997 年香港回归的国际报道中毫不费力地就看到了黄祸歧视的端倪，在 COVID-19 危机中黄祸种族主义更是肆无忌惮地复活了（参见 [Jack-Davies 2020](#)、[Siu and Chun 2020](#)、[Zarni 2023](#)）。

20 世纪 20 年代出版的、大量关于“China and the West”的报纸报道、杂志和期刊文章、通俗和学术书籍，大多旨在反对“Yellow Peril”种族主义。由于这些出版物，“China and the West”这一短语逐渐变得程式化。上述这些作品，出现于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考量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的崛起、新文化运动以及军阀时代的残酷，大多对中国人民刚刚萌发的社会抱负同情投入，并预期着中国在地缘政治中迫在眉睫重要性。这些作者通常批评殖民势力——西欧、美国、俄罗斯，尤其是声名狼藉的日本——对中国的破坏性入侵。他们主张中国和欧洲/北美人民之间加强理解，并希望达到政治和谐并成为国际盟友。然而，在呼吁文化理解的同时，他们放大了不可避免的差异；在争取政治理解的同时，他们似乎又在唤起对抗的幽灵。“China and the West”这个短语最终建议了一种需要克服种种障碍的自由主义的善意，因而，这是一种妥协了的自由主义。

杰克·伦敦 (Jack London) 的短篇小说《无与伦比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 1910 年) 向读者揭示了“Yellow Peril”极端种族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同时也示意“China and the West”自由主义作为另一种道路的可能。该小说被呈现为一份记录过去事件的未来历史文献，并以中西思想界“psychological speech (心理表达)”的不可通解为前提。该故事描述了世界如何被中国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移民以及经由日本帝国主义引入的自我更生的现代化所淹没。该故事实际上是从“Yellow Peril”谬论的逻辑衍伸。逻辑的高潮是中国被美国/欧洲领导的联盟围攻，然后其人口被生物武器消灭。该故事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它提出了对未来几十年中国周边国际动向的推测，这些推测相当可靠，而且被以后的事实揭示具有先见之明。伦敦的故事可以看作是外族憎恨症的恶果，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反证法，揭示了外族憎恨症必然导向反人类/非人类的深渊（关于此小说的细致释读，请参阅 [Swift 2002](#) 和 [Métraux 2008](#)）。无论如何，它代表了“Yellow Peril”话语的枯竭。以“黄祸”为前提的想像除了种族灭绝之外一无所有，因此必须选择另外前提，而“China and the West”这个短语代表着贯穿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丝缕不绝的系联——这种系联可以上溯到 16 世纪以来的耶稣会教士的记载。

为了简要体会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的“China and the West”这个短语的指向，我引用了两本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书籍：伯特兰·罗素的 *Bertrand Russell*《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 1922 年) 和 W.E. Soothill 苏西尔的《中国与西方》(*China and the West*, 1925 年)。

这两本书以及其他类似的著作旨在向“西方”读者解释当代中国的立场。第一人称代词和一致的称呼方式始终将文本置于“西方”的视角中。罗素自然是选取了大略属于文化与政治的领域，范围宏大；苏西尔（当时是牛津大学的中文教授）给出了历史总结或“素描”。两人都批评了欧洲、美国和日本在中国的殖民活动和贸易的破坏性记录。两人都希望中国未来在全球崛起并独立发展，同时吸收“西方”知识中有益的方面。两人都曾直接在中国生活过——罗素

曾在 1921 年至 1922 年的巡回演讲中有过短暂的中国生活经历，而苏希尔则在中国当了 38 年的传教士，之后成为一名学者，对中国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首先：占据两位作者脑海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潜在对手的鬼影——亦即 “China and the West” 之间的不和将愈加剧烈的前景。这些论述的驱动力来自 “西方” 需要抗衡 “中国对手” 的愿望。罗素 Russell (1922) 希望中国不会 “西化” 成为另一个 “不安分、聪明、工业化和军国主义的国家”；同时，他担心 “在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陷入强烈的排外保守主义” (13-14)。他最后警告中国，一旦战胜外来侵略，不要变得像 “西方” 一样具有侵略性 (251-52)。苏希尔 Soothill (1925) 的论述是直截了当的历史主义，但最后两章带着类似的疑虑转向现在。他确信中国很快就会 “复兴” (194)；并极力主张双方之间实际上没有 (或不应该有) “任何不友好的感觉”。最后，他以一位前传教士的祈祷结束了演讲，祈求 “东方” 和 “西方” 能够本着 “善意精神” 解决 “为了彼此的福祉而共同生活” 的问题 (200)。

第二：奇怪的是，呼吁理解 “中国与西方” 的前提是差异，并且这差异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无法逾越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态度与伦敦故事中 “心理表达” 差异的不可逾越的态度几乎一模一样。仿佛是，要了解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就需要了解中国的**全部**历史、**全部**文化形式和**全部**社会心理特征——事实上，需要跨越一条本质性的鸿沟。面对中国，那种适用于其他国家的物质现实、政治和经济考量、社会组织和日常生活原则的参与不知怎么就不够了。因此，罗素和苏西尔的书中充斥着对中国心理、族群、(儒家) 价值、历史积淀的大包大揽的概括。在这两本书中，当今和实际的现实似乎迷失在文明二分法和以一概全之中。事实上，20 世纪 20 年代的 “China and the West” 绝大多数研究都在建议，这个领域里牵涉的至少是一场**我们** “西方文明” 整体与**他们** “中国文明” 整体之间的对抗。直到 20 世纪末，才偶尔出现对这种所谓 “文明性整体” 的批评 (例如，[Patterson 1997](#)、[Bonnett 2004](#)、[Ferri 2021](#))。

仅参考这两本书自然会使得我们对 20 世纪 20 年代的 “China and the West” 出版物的观察过于粗线条。对此类出版物进行系统研究可能会提供更细致入微或经过修订的图景。那样的研究将会包括类似的内容翔实或论证严谨的书籍，例如：E.T.C. Werner, [China of the Chinese](#) (1919); Gilbert Reid, [China, Captive or Free?](#) (1921); Paul Hutchinson, [China's Real Revolution](#) (1924); Putnam Weale, [Why China Sees Red](#) (1924); James H. Dolsen, [The Awakening of China](#) (1925); Walter H. Mallory, [China: Land of Famine](#) (1926); Arthur Ransome, [The Chinese Puzzle](#) (1927); G.N. Steiger, [China and the Occident](#) (1927); John Earle Baker, [Explaining China](#) (1927); Louis M. King, [China in Turmoil](#) (1927) ... 仅举几例。还需要考虑大量的畅销书、新闻报道、学术论文、故事片等。还有许多中国学者用英文撰写或提供英文翻译的报道。

现在

追踪自 1920 年代以来一百年间 “China and the West” 一词的演变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可以预期，在此期间，该短语反映着各种重大的社会变革，其内涵外延的平衡和联想也随之发生迁移。至少，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冷战的两极分化、此後的全球经济和政治重组、蓬勃发展的信息和媒体流、人口流动模式的转变，都以复杂的方式影响着这个短语。似乎有可能在此期间，英语中 “China and the West” 的用法与中文中 “中国与西方” 的用法趋于一致——也许它们已经成为跨语言的镜像。所有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仔细研究。随着这个关于中文和与中国相关的流行词和流行短语的博客网站的发展，学者们可能会考虑到这些变化。

让我们稍稍停顿，以便对此短语略作琢磨，在当前时刻，这个短语的用法让人强烈地回想起 20 世纪 20 年代的用法……又来了？还是一如既往？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这种不同时代在用法上的共鸣所震撼。例如，在过去几个月里，我读到过以下以这个短语为标题的新闻报道：

‘China and the West: The Gap is Set to Grow’ ([Grant 5/6/2024](#)), ‘China and the West: How Russia is Producing Weapons despite Sanctions’ (Jamine [2/5/2024](#)), ‘Tensions Ratchet U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odd 24/4/2024](#)), ‘Solomon Islands: The Pacific Elections Being Watched Closely by China and the West’ ([Mao 17/4/2024](#)), ‘Ukraine Walks the Tightrop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Pollet 29/8/2023](#)), ‘Can Academic Joint Ventur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Survive?’ ([Economist 20/7/2023](#)). 我看过 BBC 世界新闻的纪录片 [China and the West: Shadow War \(2024\)](#), 并浏览了最近的书 *Warfare Eth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West* ([Twiss et al eds. 2024](#))。这些只是最近成为该短语标题的实例；仅在 2023-2024 年内，该短语的出现次数就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语料库。

在这些英文文本中，中国明显不再像 20 世纪 20 年代那样被视为是一个陷入困境的国家、一个陌生的社会。恰恰相反，甚至从新闻标题中也可以看出，中国被视为一个有相当实力的全球霸权。但凡涉及中国，好战的虚张声势始终弥漫在空中，仿佛现存的势力格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同样明显的是，这个短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地体现了对出现潜在或实际对手的焦虑，这种焦虑在 20 世纪 20 年代已经有所体现。更有趣的是，这个短语总是在不断提示，谈论中国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因为要面对不可逾越“文明性的”差异。在这个视角下，与中国的不同，是一种本质性的不同，仅靠分析物质的因素、衡量普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考察社会组织的一般规律是说不清这种不同的。

我怀疑，推崇这种本质主义的目的，是为占主导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服务，为他们被权力贪欲驱使的战略服务，因为声称存在不可逾越的整体性不同本是无稽之谈。然而，这个所谓的“本质性不同”是一个强大而持久的先入之见，被广泛接受，甚至在善意和见多识广的人群中也是

如此。现在，无论在说“China and the West”或“中国与西方”时的主语是哪一个，这个先入之见都在不断重现。